

中国教育的思想遗产：



汉唐

郭齐家 著

師者所以
傳道受業
解惑也



教育科学出版社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中国教育的思想遗产：

回望
汉唐

郭齐家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出版人 所广一
策划编辑 刘 灿
责任编辑 刘 灿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教育思想遗产:回望汉唐 / 郭齐家著. —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1(2014.8重印)
ISBN 978-7-5041-5587-0

I. ①中… II. ①郭… III. ①教育思想—思想史—
研究—中国—汉代 ②教育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
—唐代 IV. ① G40-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3837 号

中国的教育思想遗产:回望汉唐

ZHONGGUO JIAOYU DE SIXIANG YICHAN:HUIWANG HAN TANG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9号

邮 编 100101

传 真 010-64891796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编辑部电话 010-64981245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40毫米×214毫米 32开

印 张 4.25

字 数 87千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录

第一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 3

一 生平及政治、哲学思想 / 3

二 三大文教政策主张 / 8

三 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 / 12

四 正谊明道 / 16

五 内视反听，强勉学问 / 19

第二 王充的教育思想 / 23

一 生平及哲学思想 / 23

二 对迷信烦琐的经学教育的批判 / 26

三 性有善恶，在化不在性 / 28

四 儒生·通人·文人·鸿儒 / 30

五 学之乃知，不问不识 / 30

六 『见闻为』与『开心意』 / 32

七 引物事以验其言行 / 33

第三 嵇康的教育思想 / 35

- 一 生平及著作 / 35
- 二 越名教而任自然 / 36
- 三 去智复性，不役于物 / 40
- 四 对经学教育的批判 / 44

第四 葛洪的教育思想 / 49

- 一 生平及道教思想 / 49
- 二 入世：治国安邦，出世：得道成仙 / 52
- 三 德行，本也 / 55
- 四 吾非生而知之 / 59
- 五 养生之道 / 63

第五 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 68

- 一 生平及著作 / 68
- 二 教妇初来，教子婴孩 / 70
- 三 应世经务，德艺周厚 / 73

四 学习态度和方法 / 75

第六 王通的教育思想 / 79

一 生平及教育活动 / 79

二 国家兴衰得失在于教育 / 81

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 83

四 君子之学进于道 / 86

第七 慧能的教育思想 / 91

一 生平与《坛经》 / 91

二 『融摄空有』的禅宗教育理论 / 93

三 即心即佛，自在解脱 / 97

四 识心见性，顿悟成佛 / 100

第八 韩愈的教育思想 / 105

一 生平及教育活动 / 105

二 学所以为道 / 106

三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 109

四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 112

五 业精于勤荒于嬉 / 113

第九 柳宗元的教育思想 / 117

一 『生人之意』与『济世安民』 / 118

二 『交以为师』与『以师为友』 / 120

三 『文以明道』与『顺天致性』 / 122

参考文献 / 127

公元前 221 年，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从此我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从秦开始，中经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前期阶段，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的发展都历史地形成了某些阶段性的特征。

自秦以来，各朝代为巩固政权而营造新的上层建筑，选择自己的统治思想及其理论重心，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曲折过程。秦代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颁挟书令”以至“焚书坑儒”，终于失败了。汉初统治者吸取教训，适应现实政治需要，暂时采取了黄老之学的新道家思想作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方针，取得了“文景之治”的实际效果。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统治者不能长期处于“无为”状况，标榜“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显然很快就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汉代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强化整个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特别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形成

统一的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于是以先秦儒学为中心，吸取黄老之学，糅合阴阳、名、法各家思想精心构成的新的儒学体系应时而生了。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新的儒术定为一尊，儒家代表作被定为“经学”，朝廷立五经博士，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培养与选拔掌握儒术的人才，充实官吏队伍，倡导学者研究儒经，逐渐形成了汉唐时期的经学教育。

汉唐时期的教育思想有自己的特色，一方面，正统经学教育思想家企图改造先秦遗留下来的文化学术及教育思想，使之适应于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异端”学者也在不断吸取先秦遗留下来的文化学术、教育思想的优良传统，使之发扬光大。西汉出现了正统经学教育思想家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东汉出现了“异端”学者王充的教育思想；魏晋之际出现了“异端”学者嵇康具有玄学特色的教育思想以及道教“丹鼎派”学者葛洪的教育思想；南北朝之时出现了颜之推的教育思想，而颜以家庭教育思想为其特色；隋唐时期出现了王通、慧能、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教育思想，他们的教育思想反映了隋唐时期教育思想的特色，也预告了宋明理学教育思想兴起的必然。

以下我们就汉唐时期各具特色的教育家们的教育思想作些分析和介绍。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及政治、哲学思想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在今河北省景县境内）人，是西汉著名的儒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生于一个田连阡陌、牛马成群、家有大批藏书的大地主阶级家庭。自幼勤读儒学，“三年不窥园”，达到如痴若愚的程度。他对《春秋》公羊学与《易经》阴阳学有特别的研究，学识渊博。中年收徒讲学，“下帷讲诵”，开始了教育生涯。汉景帝时，他因专精《春秋》而被选任为博士，但因景帝崇尚黄老学说，他无事可做，仍从事教育。

汉武帝即位后，命各地推荐贤良方正之士以备咨询。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接连对他进行了三次策问，基本内容是关于天人关系问题，也称为“天人三策”，他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等重大建议，同时还论证了天人关系、天人感应、神权与君权等重大问题。汉武帝对

他的意见十分赞许。对策后，他被派到江都易王刘非那里任国相，后又被派往胶西王刘端那里任国相。晚年致仕在家，专心从事写作和讲学，但朝廷有大事，仍常派人向他请教。死后葬于京师长安西郊。有一次武帝经过他的墓地，特下马致意，所以他的墓地又名为“下马陵”。

他的著作很多，但绝大部分失传了。流传至今的只有一本《春秋繁露》和《史记·儒林列传》及《汉书·董仲舒传》中的有关资料。“天人三策”（即“举贤良对策”）载于《汉书·董仲舒传》中。

《汉书·五行志》曰：“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董仲舒用《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来改造先秦儒学，并容纳刑名法术、阴阳家思想，以天人关系问题为中心，建立了一套新的儒学，其要点如下。

（一）天创万物与天人感应

董仲舒抬出“天”作为宇宙人间的最高主宰，他说，“天”是“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义》，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他的“天”既有神学人格性，又有自然物质性。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顺命》），“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为人者天》）。他说天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人的形体以及精神上的各种表征，完全跟天自体相同。他以天人同类为根据，提出了“天人感应论”，认为天人既然同类，其间必然会互相感应，代天而治民的君主，其行为的好坏，能直接影响天，天能进行严格的赏罚。如君主施行仁政，上天就能降下“符瑞”或“祥瑞”现

象，以示天的奖励或授命；如果君主施行暴政，上天就会降下灾异现象，以示“谴告”，而这种谴告也是天对君主的爱护与挽救。

董仲舒反自然事物伦理化，把自然的天赋予了人格（意志、命令和感情），其基本精神，恰恰是为了论证封建社会秩序与自然规律之间的统一性，他认为天人之间彼此交通感应、协和统一，才能取得整个“天人”结构的均衡、稳定和持久，这既是“天道”，也是“人道”；既是自然事物的运行法规，也是人间世事的统治秩序。

（二）皇帝至尊与君权神授

董仲舒认为人类社会组织是天安排的，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最高权力的君主“替天行道”。皇帝是天的儿子，是天派下来统治万民的，是唯一合法执行“天意”的人，要服从“天意”，就要服从皇帝。他说：“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祐而子之，号称天子。”（《三代改制质文》）“《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玉杯》）意思是说，按《春秋》的法则，臣民应当服从君主的意志，君主应当服从天的意志，因此，抑制臣民而伸张君主，抑制君主而伸张天意。他还认为国家机器的官僚系统，也是天按照自己的形象构制的。皇帝是神的首脑的显现，其他三公、九卿、元士是神的耳、目、口、鼻、手、足各部分的体现，是派来帮助皇帝的。他建立了君权神授的学说，从神学上证明了君权高于一切，统治和教化的权力都要集中到皇帝手里，使君权和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神圣化。但在强调君是民的绝对统治者的时候，董仲舒也有这样的意思，民只有通过“天”才能制约君。也就是说，民只有假借“天”威，规谏皇帝不要过分残暴，以免受到天的惩

罚。对君来说，“民”就是“天”，“民意”就是“天意”。这在客观上也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三）王道三纲与阳尊阴卑

董仲舒认为“天”的意志是通过“阴阳五行”来表现的。他认为“天”是“阳贵而阴贱”（《天辨在人》），“亲阳而疏阴”（《基义》）。“凡物必有合……合各有阴阳”，“天道在阳而不在阴”，“阳兼于阴，阴（被）兼于阳”。（《基义》）他把“阳尊阴卑”的理论引用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认为君、父、夫属阳，臣、子、妻属阴。臣、子、妻是配合君、父、夫的存在而存在的，臣、子、妻要绝对服从君、父、夫。他继承了孔子、荀子的正名思想，又吸取了韩非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忠孝》）的思想，概括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纲”者，网之大绳也，引申为“纲领”、“主宰”之意。这就是说，君、父、夫对臣、子、妻有绝对统治、支配的作用，并把“五常”作为调整和补充“三纲”的道德规范。他还进一步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认为“三纲”来源于“天”。董仲舒的目的是从理论上确证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君臣父子的严格的统治秩序，而这统治秩序的维护又依赖于“天”。

（四）“任德教”与“奉天法古”

董仲舒还利用天道“阳尊阴卑”的思想，为儒家的“德治”找到了“天意”的根据。他说：“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阳尊阴卑》），王者应“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

刑”（《举贤良对策》）。他认为“德教”可以收到严刑峻法所收不到的效果。当然他也不反对刑，把刑作为“德教”的辅助手段。他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精华》）这是董仲舒总结了秦亡的教训，把先秦儒家一贯强调的“仁政”、“德治”提升和放大到宇宙论的高度，认为君虽高踞于万民之上，却仍要受“天”的制约，这种制约主要表现为反对任刑滥杀，而主张道德教化，所以他说：“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举贤良对策》）

他认为封建统治秩序是万世不变的。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举贤良对策》）道出于天，又万古不变，从这出发，他又提出了“奉天法古”的主张。“奉天”是为了“奉道”，“法古”是为了“法道”。

总之，董仲舒的新儒学已大大不同于先秦的儒学，它使儒学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它不但总结了过去，吸收、包容了道、法、阴阳各家，而且日渐渗透深入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把先秦儒学的思想与阴阳五行家的学说具体地配置安排起来，从而使儒家的伦理政治纲领有了一个系统论的宇宙图式作为基石，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成为冉冉上升的新社会和新王朝制定统治秩序的先进理论，这是董仲舒思想中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积极的一面。然而董仲舒的思想中具有神秘化特色，他强调的“三纲五常”，高度地集中地反映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随着封建社会由上升发展演变而走向停滞和衰落的时候，其保守、障碍的作用也就越来越明显了。

二、三大文教政策主张

董仲舒为了适应汉武帝的政治需要，在他接受汉武帝亲试“贤良”之士的三次策问中，为汉王朝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他想以政治的手段，凭着国家的力量，推行其教育主张。

（一）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西汉前期，朝廷虽立了儒经博士，但是指导政治的却是“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与法家政治的杂用，在统治思想上还显得薄弱与纷乱。这有碍于封建统治制度的巩固与封建事业的发展。儒家虽曾为此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且在斗争中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但是独尊的地位始终未曾取得。董仲舒根据当时政治的需要，把“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先秦儒学加以改造，并利用《春秋》经文字简单隐晦、便于穿凿的特点，对其中的“大一统”思想加以发挥，认为要保证政治法纪的大一统，首先必须加强思想的统一，所以他对武帝建议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举贤良对策》）意思是说，《春秋》经重视一统，这是天地不变的原则，是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人们所学的道理不同，议论各异，诸子百家学说不同，意旨异样，所以上面不能掌握统一的标准，法制屡次改变，在下面的不知应当如何遵守。他的意见是，凡不属于六

艺（即六经）的科目和孔子的学术的，都一律禁止，不许齐头并进。这样邪僻的学说消灭，然后学术的系统可以统一，法度就可以明白，人民也知道所应走的方向了。董仲舒在这里明确地提出要以“独尊儒术”作为统一的指导思想，用来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而使臣民知其所守与所从。

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的主张，改变了汉初黄老“无为”之计而行“有为”之术，继承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的儒家精神，并克服了独任法吏以逼民反的忧患，而行德政以安抚感化百姓的善治。这最适合于加强封建中央皇权和巩固封建制度一统天下的事业，因此被汉武帝所采纳，作为汉王朝统一的政治指导思想和文教政策的主旨。这一文教政策规定了教育的目的是在培养通经致用的儒学治术人才，用“三纲五常”维系人心，以确保汉王朝的长久安宁。在“独尊儒术”政策指导下，儒学的典籍被尊称为“经”。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专置了儒学《诗》《书》《礼》《易》《春秋》的五经博士。由此，原有的治诸子百家之学的博士遂不见用，而由儒者垄断博士职位。博士们传授儒学，儒经成为汉王朝的法定教育学科和内容。因此儒经受到了极大的尊崇，并有了广泛的传播。教学目的、内容及教材空前地统一起来，学校教育基本上成了经学教育，教师们讲解五经，培养学生掌握纲常之道而为政治民。读经以统一思想 and 学儒为仕，这是汉代教育的重要特点，对后世封建社会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提出与实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统一了思想，使封建教育有了统一的教育目的和内容，大大促

进了教育的发展并培养出一定的人才。但它杜绝了百家争鸣，使学术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以儒家经典为教育内容，用严格的师法家法代替了自由讲学，书本知识在教学中占据了主要地位，章句训诂代替了现实问题的探讨，这又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二）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

为了培养和选拔精通儒经并能“尊王明伦”的治术人才，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开创太学培养贤士和进行教化工作，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举贤良对策》）意思是说，平日不养士而想要求贤，好像不雕刻玉而要求玉有文采，那是办不到的。所以说培养人才没有比办好太学更重要了，太学是贤士所由出，是教化的本源。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兴办太学，聘请高明的教师来教养天下的士人，常考核他们，来发展他们的才能，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下诏在长安正式成立了太学，以儒学博士为学官（专职教师），招收弟子，授以儒经，为国家培养官吏。汉武帝除在京城长安设立了中央的最高学府（太学）之外，还下诏在州郡设立地方学校。

然而设学养士的人数有限，且培养的周期较长，因此董仲舒又提出选士的办法，即建议各级官员重视发现、推荐和选拔社会上既有的人才。他向汉武帝建议：“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